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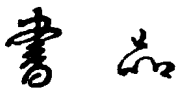
SHUPIN

二〇一〇年·第二辑

书品

- ◎汪学群 读中华书局《清儒学案》标点本
- ◎吴书荫 一编在手忆师友
- ◎黄进兴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新版序
- ◎李世文 书情书色里的人和事

中华书局



2010年第2辑(总第122辑)

双月刊 单月20日出版

专题书评

- 汪学群 读中华书局《清儒学案》标点本 3

学林往事

- 吴书荫 一编在手忆师友
——暨《梁辰鱼集》再版后记 8

序跋鼎

- 黄进兴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新版序 16
王瑞来 《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前言 19

编撰撷谈

- 李世文 书情书色里的人和事 26

评书论学

- 苗怀明 精雕细琢 嘉惠学林
——《金圣叹全集》简评 32

- 童岭 巴黎的忧郁与被遗忘的中国古典经学 36

- 叶蕾 本土文献与域外汉籍视域下的选本研究
——读《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 45

- 王承军 善读史者,惊服其博洽
——《李源澄著作集》读后

- 陈友康 博学明辨 光显前贤 嘉惠后学
——说《孔凡礼文存》 60

- 曾昭聪 读《历代避讳字汇典》 67

李 康 试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72

读书札记

赵兴勤 由清人诗文集编年谈起
——兼订《瓯北集》赵翼史实之误 75

彭向前 释“结珠龙” 81

商榷篇

宗 亮 并不成立的《清实录》“紫绫本” 83

李 豪 《旧唐书·西戎传》勘误 87

书苑精英

陆西星著 蒋门马点校《南华真经副墨》 翁文灏著 李学通选编
《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 翁文灏著 李学通、刘萍、翁心
钧整理《翁文灏日记》 沈国威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
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黄 松 副主编：冯宝志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 彦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电话：(010)6345823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读中华书局《清儒学案》标点本

汪学群

清代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可以视为对古代学术思想的总结。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编撰,清人已开其先,有代表性的,如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唐鉴《清学案小识》,但二书都有片面性。《清学案小识》以程朱理学为主,门户之见极深,而且对各家学术思想介绍未免过于简单。《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虽然叙述清代汉学和理学的学术渊源与概貌,但过于疏漏。江书囿于汉学而不能自拔,唐书则为宋学张目,皆不脱清代汉宋之争门户之见。另外,搜罗选目也颇有偏颇与遗漏。另有黄嗣东《道学渊源录》中的《圣清录》,只录小传,于各家学术思想资料,付诸阙如。

民国初期由晚清遗老徐世昌领衔编撰的《清儒学案》弥补了以上诸缺陷。此书以《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为样板,在结构层次上与《宋元学案》相似,叙述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传授渊源,脉络十分清楚;在学术思想宗旨上和《明儒学案》相同,主张破除门户之见,兼收并蓄,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的学术思想。此书于1939年出版。全书共二零八卷,正案一百七十九人,附案九百二十二人,另列诸儒六十八人,共计介绍清代学者一千一百六十九人,涉及的学术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以及舆地、诗文等学科,可视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百科全书。它的问世从整体上填补了清代学术思想史著述的空白,是我们每个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必读之书,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清儒学案》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列举以下三方面:

第一,概括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即所谓“崇儒重道”的道统观。清代作为满族统治的王朝,其统治者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儒学的建设,尤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并把它当作笼络汉族士大夫们的手段,这样从客观上促进了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学进一步发展。《清儒学案》抓住了这一特色,突显了道统儒的地位。《清儒学案凡例》开宗明义说:“是编以从祀两庑十一人居前,崇圣道也。”这十一人分别是孙奇逢、黄宗羲、陆世仪、张履祥、顾炎武、王夫之、汤斌、陆陇其、颜元、张伯行和李塨,为清代从祀孔子的学者排队,进一步发展了宋以来传统儒家的道统观。清代统治者还把道统的树立与教化联系在一起,期以改变世道人心,《清儒学案》的编撰者也强调了这一点,即道统与教化相结合。如《清儒学案序》说:此书的编纂“以继梨洲二书之后,愿与当世学人共相参考,俾知学术为天下之公,殊途同归,咸主于有用。因学以明道,修道以为教,冀以端本善俗,范围曲成”。本此,《清儒学案》所选录诸案主的学术思想资料充分体现了“崇儒重道”、“修道以为教”之用心,以期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第二,注重学术思想渊源及流变。从狭义上说,《清儒学案》每立一位案主,在搜集资料时十分重视学术思想师承,包括案主与同时代人的交往互动,以及与前代一人、后一代人的学术思想承接等,使他们学术思想联接成横向与纵向网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线索。从广义上看,《清儒学案》大体把清代学术思想分为康熙、乾嘉、道咸三个时期,在指出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同时,又根据不同时期标出其学术特点。如康熙时期,为学重在“经世致用”,所谓“德行而兼政事者也”;乾嘉时期,为学重在“精研考证”,所谓“精研考证,风尚稍异”;道咸时期,为学重在“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之学”。如此一幅清代学术思想演进与发展的脉络图展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程朱与陆王兼顾,汉宋兼采,不存门户之见。《清儒学案凡例》说:“清儒众矣,无论义理考据,高下自足成家。”《清儒学案

序》也说“实事求是与格物穷理”。宋学义理和汉学考据兼容,汉学求是与宋学穷理并蓄,把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打并归一。从《清儒学案》收录的学术思想资料来看,清代学术思想以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的对立和融合为主线,并贯穿于始终,而这又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交织在一起。具体而言,清代初期大体沿着由陆王向程朱、宋学向汉学的转变,清代中期大体沿着由扬汉抑宋向汉宋兼采转变,清代后期大体沿着由抑汉宋向程朱,兼采汉宋转变。推崇程朱理学,兼采汉学和宋学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基调。这一基调与清廷定程朱理学于一尊,倡导通经学古及编纂整理古籍等文化政策有关。

《清儒学案》也不乏失误之处。在编纂体例上,《清儒学案凡例》规定以学者“生年为次”,却又提出“以从祀两庑十一人居前”。在学术思想资料取舍方面有失允当,如傅山作为顾炎武《亭林学案》的“附案”,介绍过于简略,吕留良附在张履祥《杨园学案》交游中,唐甄只列在《诸儒学案》。对一些著名学者及其著述,如清初的方以智、朱之瑜、谈迁、屈大均,以及晚清的杨守敬、郑观应、马建忠、廖平、康有为等,被排斥在《学案》之外。官献瑶分见于蔡世远《梁村学案》和杨名时《凝斋学案》,尹会一《健余学案》父子相混等。凡此疏漏主要皆由编纂者政治态度所致,另外也与该书卷帙巨大、急于求成于众人之手有关。

翻阅这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觉得中华书局历来走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前列,出版了大量的古代学术精品,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扎扎实实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书局选择并通过《清儒学案》的立项,并新近出版了这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图书,填补了《清儒学案》没有现代标点本的空白。即使就选题而言,也可谓高瞻远瞩,别具法眼。

应该说,《清儒学案》的内容博大精深,对它的点校难度相当大,如果没有丰富的古代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好在中华书局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古籍整理队伍。他们的学识与功力在出版界是

出类拔萃的,而这次的点校者沈芝盈、梁运华两位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老一代的编辑,他们有几十年的整理点校古籍经验,参加过多部古籍整理。由他们点校,断句精准,校勘无误,尤其是校勘涉及经史子集四部,颇显出深厚的功力。下面试举几例。

第一,改字。孙奇逢《夏峰学案》讲到夏峰弟子时,有“张仲诚、赵宽夫、汤潜庵、耿逸庵、李霞表、马构斯、耿保汝、孙君侨、陈孔恕”(《清儒学案》第49页,下略)一句,原书(指《清儒学案》,下同)作耿极,耿极字保汝,此处改为耿保汝,与其他人书字相同。陆世仪《桴亭学案》所选《思辨录辑要》“欲教童子歌诗习礼”(第145页)一句,原书童作重,据《思辨录辑要》改为童。张履祥《杨园学案》所选《训子语》“亦岂有在我尽受富贵逸乐”(第237页)一句,有在原书作在有,据《训子语》改为有在。顾炎武《亭林学案》所选《日知录》“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第287页)一句,土原书作上,据《左传·成公二年》改为土。又所选《日知录》“干宝《晋记》”(第288页)一句,干原书作于,今改为干。

第二,补字。黄宗羲《南雷学案》所选《文集·与友人论学书》“以辞让言一体亦可也”(第73页)一句,原书无“言”字,据《黄梨洲文集》补入。陆世仪《桴亭学案》所选《思辨录辑要》“乱世书籍多毁于兵火”(第155页)一句,原书无乱字,据《思辨录辑要》补入。顾炎武《亭林学案》所选《日知录》“《武成》惟一月壬辰”(第278页)一句,原书缺“一”字,据《尚书·武成》补入。

第三,删衍字。黄宗羲《南雷学案》所选《文集·与友人论学书》“其归则一也”(第77页)一句,原书则字上衍一则字,据《黄梨洲文集》删去。

点校者在校勘时,凡有改动,或发现原书有疑误处,均出注当页,以便核对检查。例如,陆世仪《桴亭学案》所选《文抄·与陈言夏论易书》“至《说卦》、《广卦》、《序卦》、《杂卦》”(第200页)一句,《周易》无《广卦》,未改原书,但从旁指出其误。张履祥《杨园学案》所选《文集·答颜孝嘉论学十二则》“《记》曰:师无当于五

伦”(第248页)一句,《礼记》作“五服”,未改原书,则列出异文。

另外,书后又编有《清儒学案》人名索引,并予以说明:一、索引以姓名作主目,其他称谓一律附注于后。例如:方宗城(存之、柏堂)。二、为方便查阅,主目后所注称谓一律列出参见条目。例如:存之(见方宗城),柏堂(见方宗城)。三、主目后列出师承关系及所在卷数和页数。例如方宗城(存之、柏堂),仪卫家学*89/3582,拙修交游159/6206,前一数码是卷数,后一数码是页数。“*”号为标示传文所在,出处单一者不标“*”号。凡此均给读者检索带来诸多方便,并便于了解某学者的学术师承与交游、家学渊源等。

《清儒学案》一书为精装本,外观十分精美,其装帧古朴典雅,与其内容的博大、点校的精准,内外合璧,相得益彰,伏案阅读,爱不释手。

总之,中华书局《清儒学案》标点本的出版是一件嘉惠学林的一件大好事,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

(《清儒学案》,全八册,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
中华书局2008年10月,760元)

一编在手忆师友

——暨《梁辰鱼集》再版后记

● 吴书荫

《梁辰鱼集》1988年出书,迄今已逾十载。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通知我再版此书,我感到非常欣慰。从1981年《鹿城诗集》的发现,到着手编校此集,到艰难出书,到即将再版,其间经历了将近三十个春秋。回忆往事,追怀师友,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1981年秋,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脱产研究生,研修中国戏曲史。除了必修的专业课外,我几乎都泡在北京各大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查阅戏曲典籍,尤其关注曲家的诗文集。当我从北京图书馆查到尘封已久的《鹿城诗集》清抄本,如同发现一颗太空里的新星,感到特别兴奋。梁辰鱼的诗作,我仅在俞宪《盛明百家诗》中见过《梁国子生集》一卷,而此集二十八卷,各体诗皆备;卷首冠有文徵明、屠隆、王世贞三序。从该书扉页所钤“古吴梁氏”等印记来考察,我怀疑它是伯龙后人散出之物。这个集子鲜为人知,从不见学者称引,说明我们对梁辰鱼的研究还很不够。对明清戏曲史作深入研究,只出版戏曲作品集还不够,为了知人论世,希望更多刊印经过整理的曲家诗文集。

可是经过整理点校出版的戏曲家的集子,不过寥寥几种,至于明代曲家只有《汤显祖集》一种,中华书局编就《徐渭集》,当时尚未付梓。而梁辰鱼作为嘉靖、万历时的昆曲大家,应该有自己的诗文曲的合集,才能同他在戏曲史的地位相称。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戏曲研究所新成立的戏曲文献研究室工作,于是萌发为伯龙编校集子的愿望,想通过具体的操作实践,拓宽自己的思路,掌握从事

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尽快使自己进入专业研究的角色。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责编刘辉学长,与徐朔方先生过从较多。有一天他来找我,说徐先生正在编校《沈璟集》,想托我从乾隆杨志鸿抄本《曲品》为他复印有关沈璟的材料。我很快就将复印件寄去。从此,我和朔方先生经常通信,讨论问题,交换资料和心得。

1982年春,张庚师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提出校点百种明清传奇的计划,让我们文献研究室负责这项工作。我致函朔方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同时也想倾听对辑校梁集的看法,很快就得到他热情洋溢的回复:

《鹿城集》只见抄本,且不全。有文徵明、屠隆、王世贞三序。书在苏州博物馆。我曾摘录若干,到京后如得与您所见本相校,片刻间就可见出何者较好。承告标点明清传奇计划甚佳。鄙意以为有诗文集存留者,以诗文曲合收一集较好,不必强求一律。如梁辰鱼可出一《梁辰鱼集》,甚愿足下率先完成。它如《白兔记》近有新本发现,可以数种不同本子同刊一集。此指异文较多非校勘记所能尽者。我已入暮年,精力有限,只能整理旧作使之不成废纸而已,不能再有所作为,好在足下辈后来居上,大有作为。放翁诗云:“功名在子何殊我,但恨无人快着鞭。”今有人矣,复何憾之有?(1982年4月22日来信)

他不仅支持我们搞这个集体项目,而且还向我提供苏州所藏残抄本《鹿城集》的信息。所引用陆游诗句,不仅是对我个人,也是对广大后学寄予的厚望。我很快就草拟出《〈梁辰鱼集〉辑校设想》的初稿。

这年6月,朔方先生来京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编委会,11日约我去东方饭店相见。因为初次晤面,寒暄过

后,就问我《梁辰鱼集》动手没有,我禀告正在核查各种版本的情况。下午去拜见王季思先生(1960年,教育部调先生来北大参与编文学史时,曾为我们讲过一学期元杂剧),先生虽然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记忆清晰,待人和蔼可亲。他谈完对校点百种明清传奇的意见后,便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将《关于〈梁辰鱼集〉辑校的设想》呈请他过目。先生阅后,觉得构想很好,鼓励我快点儿将它搞出来,如果北京不好出版,他可以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并叮嘱将评本《浣纱记》的评语吸收进来(见1982年6月11日日记)。

两位老师的信任、关怀和支持,对我既是莫大的鼓励,也是一种有力的鞭策。如果他们的态度略微冷淡或迟疑,我就会改弦更张,放弃这个选题。后来王先生来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有一次我和同事去宾馆看望他,先生还记忆犹新,问起辑校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我这个接触不多的学生,还那么关心备至。

上世纪80年代末,古籍出版正处于举步维艰的时期,《梁辰鱼集》暂缓印行,先生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早归道山了。但是先生对我的教导,时刻回响在我的耳际。明刊《浣纱记》只有李卓吾和汤显祖(即怡云阁本)两个评本,二者评语如出一辙,显然都是伪托,不过某些看法也有可取之处。由于受到版面的限制,故未能按照先生的要求,吸收到《梁辰鱼集》中去。但我认为先生的建议,能为读者阅读着想,故我在为中华书局《明清传奇选刊》点校《焚香记》时,遂将每折的评语摘出,置于书后,供广大读者参考。

至于我和朔方先生的交游,谊兼师友,经久弥笃。1996年2月,我随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工游览黄山,返京时取道杭州,下榻杭州大学招待所。晚饭后,我直奔西溪路杭大新村看望徐先生,他说:“我还以为你昨日到,和战垒去招待所,结果扑了一场空。”我感到很抱歉。那天我刚落座,一杯清茗过后,他提议到校园里走走。我俩边走边聊,兴致很浓。上月初,“梁集”的责编来信,说已将书稿处理完,让我尽快写一篇前言。我趁机向朔方先生求序,他满口应承。次日我想再去徐寓,未料当晚他和吴战垒兄一起

来送别,还未等我招呼,劈头就说:“序不能写了,我们对《浣纱记》的创作年代有分歧,叫我怎么动笔?还是彼此保持自己的看法比较好。”先生并非出尔反尔之人,他就是这样坦率执着,凡是与他有过接触过的人,都了解其脾气秉性。当然我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他鼓励我将不同的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这年底接到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的邀请函,希望我1997年6月赴台北参加明清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是我撰写了《〈浣纱记〉创作年代及版本考》作为提交会议的论文^①。

当1998年《梁辰鱼集》出版,徐先生接到我的赠书后,立即复信:“忽奉梁集,得此厚赐,即先作快读。”当时他正在校阅新出的《汤显祖全集》,未能将拙编读完,只看了一部分。过了大半年,他又在信中表示歉意:“尊著《梁辰鱼集》,犹未逐字读毕,殊觉惭愧。”他随手所摘出的数条异议,我准备趁这次再版,参照订正。后来陈平原教授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库》,聘请朔方先生主编《南戏与传奇研究》卷,选了拙作《〈梁辰鱼集〉前言》。这是一篇书序,出版社要求写三四千字即可。因为篇幅不长,要做到面面俱到,只能蜻蜓点水,难以畅所欲言。我觉得此文不配入选,请先生将它拿掉,他同意改为《〈浣纱记〉创作年代及版本考》。但出书时还是保留了前一篇。其用意我一直迷惑不解,后来他的助手孙秋克代笔告知:“鉴于梁辰鱼及《浣纱记》在传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故徐先生决定收您的《〈梁辰鱼集〉前言》。”

在《梁辰鱼集》辑校选题的最后确定和书稿出版的过程中,陈振鹏先生起到重要的作用。我有幸和他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3年5月9~11日,为了完成郑振铎先生的遗愿,完成他未竟之业,社科院文研所邀请有关单位研究《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的编印问题,我和副所长陈义敏作为戏研所的代表应邀

^① 见华玮、王爱玲主编《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

与会。会上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副总编陈振鹏先生,我觉得此公不苟言笑,显得很严肃。他作为《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出版方的领导,在会上向李一氓先生及与会者详细汇报承印的准备情况,胸有成竹,说得头头是道,甚至每本线装书的装订费用,都核算得一清二楚。李老听了频频点头,大家也都很佩服。他的思维缜密、虑事周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忽然想起王季思先生的话,尽管《梁辰鱼集》的辑校工作还未完全提到日程上来,但遇到这样难得的机会,何不未雨绸缪,先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通通气,挂上钩呢?可王先生年事已高,怎能再给他添麻烦呢?于是,我鼓起勇气,晚饭后去拜见陈先生。他已经不像初见时那么严肃了,不过还是不动声色,直到认真听完我的毛遂自荐后,脸上才泛起一丝微笑,表示对这个选题感兴趣,让我将“辑校设想”寄给他。最后说,我回去研究后再给予答复,并希望以后多联系。此刻我觉得他很平易近人,甚至连他那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听起来也很亲切。

7月上旬,我突然接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正式公函,同意接受辑校《梁辰鱼集》的选题。接着振鹏先生也示下:

回沪后即向第一编辑室转达,今已决定接受此选题。……工作可从容为之,以期精善,不必太赶时间。“设想”各条都可同意。戏曲部分的校勘记,对异文出校可略放宽,以供研究者参考;至于是否都有价值,或去或留,再由编辑部判断,因我社校勘戏曲在进行中者尚有几种,对校勘记宽严程度当求大体一致。先多留一些校记,可有余地作比较平衡,免致定稿时淘汰过多,不易索补。文字繁体直排,格式可参考我社《汤显祖集》。曲文不必分正衬字,因标准不易确定。贤如南方某先生,所为亦未必称善,不可强求也。

他很重视校勘记,这是古籍整理的重要部分,也是提高书籍质量的保证。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要求既具体又细致,连注意事项也为我

考虑到,并推荐了《汤显祖集》作为样本。这封信不仅是我的辑校工作的指导,而且也体现出老一辈学者严谨踏实的风格,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我每次去上海出差或者探亲,都要去武林新村住所看望他。1985年5月,他虽然离休在家,但离而不休,仍在家里继续为本社或上海辞书出版社审稿。这年秋天,我到沪、宁一带访书,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几种书后,第二天即奔苏州。当天下午,去向陈先生告别,他正伏案看校样,得知我由同窗宣树铮安排,下榻苏州大学招待所,便说:“《剑南诗稿校注》已经三校了,仍有个别问题,还需要与钱仲联先生沟通。你来得正好,替我带一封信去,也顺便去看望他。”接着又说:“听老先生一席话,也是胜读十年书。”振鹏先生是位特别敬业的编辑,审稿素以严谨细致著称,像唐圭璋、邓广铭、钱仲联等著名专家,都因为书稿得到他的修正和补充,而在前言中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①。

他不仅对老专家如此尊重,对我们后学也非常关爱。记得1987年11月,我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修订校注本《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时,遇到一些难以判断或解决的问题,因客中无书可查,而交稿的时间又很紧迫,我就去求教振鹏先生。他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能解决的问题,当面予以回答;至于需要查书的地方,过不了一两天就将结果邮寄来,在每条解释的后面,都引用书证,详细注明出处及卷数。他不仅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而且那种古道热肠、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由衷感谢,深深敬佩。

振鹏先生非常勤奋,挤出编余时间,笔耕不辍。他每出一本新书,都给我寄来,我的书架上有《坦园日记》(校点本)、《谜语》、《古文鉴赏辞典》(与章培恒共同主编)以及连环画《胆剑篇》等。他才思敏捷,钟情于谜语,所藏清末《百二十家谜语》未刊稿,是一部重

^① 见高克勤《满腹才识尽为书——陈振鹏怎样做编辑》,《编辑学刊》2008年第3期。

要的谜语集成。此书为古吴莲勺庐所辑。莲勺庐主人不仅是灯谜家,而且也是一位戏曲家,他所抄写的明清传奇有百种之多,为郑振铎、马廉、傅惜华、周越然等珍藏。而“莲勺庐”何许人,向来不为人所知。从此书卷首序文的题署可知,他是清末苏州的张玉森,这就有利于搞清楚其人其书。先生曾做过编剧,擅长于度曲。《胆剑篇》由程十发绘图,他配以北曲小令百首,恐怕找不出第二本这样的连环画。此书曾获1981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脚本一等奖;1999年作为《人民美术出版社五十年连环画收藏精品》重新出版。因为是竖排本,但又采用横排的装帧,看起来非常别扭,且手民误植处也不少,很难让人恭维它是“收藏精品”。但程十发的绘画配以先生的北曲,却是珠联璧合;再加上有先生的亲笔题赠,并对夺误和标点都作了订正,我仍爱不释手,什袭珍藏。

2002年,陈先生乔迁至徐汇区双峰路,即来信告知我新址及电话。这年10月底,我应吴战垒兄之约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回程先返沪,专门去新居看望。几年未见,对我突然来临,他显得很兴奋。但当我感谢寄赠《胆剑篇》时,他苍老而消瘦的脸上却露出苦笑,连忙摆摆手,示意不要再说了。我深深感受到一位耄耋之年的老编辑、老出版家,对当下出书质量的无奈和痛苦,后悔自己出言不慎。临行时,他执意要送我下楼,指点乘车站。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相聚。2005年4月16日,先生病逝,享年85岁。他尽为人作嫁,而自己却留下一部尚未整理完稿的《陈迦陵文集》,据云已列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我相信上海古籍出版社会作为精品书奉献给广大读者。陈振鹏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莞尔!

在此书辑校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还有不少,非三言两语所能觊缕,但我会永志不忘。1998年1月,《梁辰鱼集》编就。当时古籍出版正处于低谷时期,如果没有李国章、李梦生等社领导的鼎力支持,像这种赔钱书很难出版;责任编辑史良昭先生也为此书付出辛勤的劳动,这里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2001年5月18日,古老的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后,从海外到国内掀起了昆曲热,《梁辰鱼集》也受到青睐。据良昭先生告知,有海外华裔读者来信,赞扬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感到非常兴奋。此书初版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通过这次再版予以弥补,力争以新的面貌出现,这样才能不愧对已故的师友及关心此书的读者。

2010 年立春

(《梁辰鱼集》,吴书荫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5 月再版,66 元)

新书《太和正音谱笺评》出版

(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中华书局 2010 年 1 月,39 元)

《太和正音谱》是最早的北曲曲谱。此书大致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有关北曲的论述及史料,包括曲的体例、流派、制曲技术、北杂剧题材分类、古剧角色源流考辨等;另一部分为北曲谱,依据北曲 12 个宫调的分类,列举各个支曲的句格谱式,详注四声平仄,标明正衬,选录元人或明人的作品为实例,是专为创作北曲制订的标本。本书由姚品文点校、笺评,洛地审订。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新版序

● 黄进兴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藪。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中“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垄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

* 中华书局即出。